

# Analysis on the Politics of Qi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Yu Zhou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1418, China

## Abstract

Confucian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plendid traditional culture. It embodies the "Confucianism" and "foreign kings" of ruling the country and reinforces the humanistic view of politics. The Qing people's "six virtues" theory,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modest way to argue against self-sufficiency, and the "eight techniques" theory are the recogni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way of governing.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olitics of this period and summing up the essence and deficiencies in their thoughts, is the only way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to creatively develop and innovate with the outstand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 Keywords

Qing dynasty people; politics; "six virtues"; "eight techniques"

## 论清朝人的为政之道及其影响

周好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中国·上海 201418

## 摘要

儒家为政之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点体现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体现了为政在人之人本主义的为政观体现。而清人的“六善”说、调查研究之道、去争论戒自满的谦虚之道、“八术”说就是对传统为政之道的认知和创新。深入地分析这一时期的为政之道,总结其思想中的精华与不足,是当代中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融合的必由之路。

## 关键词

清人; 为政之道; “六善”; “八术”

## 1 引言

清人的为政之道基本上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历史上传统为政之道的的基本认知。整理和分析清朝的为政之道是当下中国人深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是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提高为当代政者提高治国理政素质的需要。

【基金项目】本文系第四十五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近代经世派的行政管理思想研究》(20090450635)、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项目《中国近代行政决策思想研究》(14ZS153)、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运用研究》(18JDSZK075)的成果。

## 2 唐甄的“六善”说

唐甄(1630年~1704年,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的六善论着重强调为政者遵循由内省向外发的六个关联度颇强的学习能力、处事能力、思辨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和管理心理的能力。

唐甄认为为政之道必需要具备违己、从人、慎始、循中、期成、明辨“六善”方面的素质。他尤其强调作为“圣人之隼”的尧舜都不敢自以为是,更何况圣贤程度都远逊尧舜的一般人。他引经据典地阐明了他的论点。

第一,违己。他说:“《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之非道。逆己非逆,逊己非逊,勿己之是,惟道之归,是谓违己。’”<sup>[1]</sup>违己之道的根本在

于在任何前提下都以道(客观标准)为准则行事,而不是以个人的喜恶为尺度。

第二,从人。唐甄认为,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邑有一郡一邑之智,这都是人类智慧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作为个体的人,就必须遵从群体乃至社会的行为规范。“我有好,不即人之所好,我有恶,不即人之所恶,众欲不可拂也。以天下之言谋事,何事不宜;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达!”《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蕘,人无贤愚,皆我师也。是谓从人。”<sup>[1]</sup>可见,从人之道的根本在于在任何前提下都以学习的心态去行事。

第三,慎始。唐甄认为,行事的关键在于开始之时的审慎。人们要辩证地思考可为与不可为之事,因为事物往往会出现“见以为可,而其中有不可者焉;见以为不可,而其中有可者焉”的态势,所以人们必须反复思考。在他看来,这种辩证是思维能力不需要高超的智慧,作为普通人完全可以做到“思而逐行之,”切忌“不思而逐不行。”这个道理对于为政者也同样适用。他说:“发政如发矢,矢发不可复反,政发不可复收。《书》曰:‘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鹄之度在目中,不省则不见也。是谓慎始’。”<sup>[1]</sup>慎始之道的根本在于在任何前提下都不能以表象为依托,必须探求事物的本质,反复思考之后才开始行事。因为政令犹如开弓没有回头之箭,一旦执行就不可能再收回。

第四,循中。他认为为政者必须克服欲速不达,厌倦若忘,半途而废的缺失。因为为政者“中道而废,则民多玩,后虽有作,不可为矣。《诗》曰:‘不竞不綵,不刚不柔,敷政优优。’又曰:‘不震不动,不戇不悚。言不欲速也,毋厌倦也。如农夫之耕耘,四时不失序焉,日月见其长焉。是谓循中’。”<sup>[1]</sup>循中之道的根本在于在任何前提下都必须持之以恒,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行事,循序渐进,不厌其烦,有始有终。

第五,期成。如果为政者小器、志满,即便是在慎始、循中的前提之下,也难以期成。他说:“宣王,中兴之君也,及其德衰,而小雅之刺者三章(祈父、黄鸟、我行其野);桓公,五霸之盛也,及其气矜,而葵丘之叛者九国。不啻此也。《书》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武王圣人也。召公犹虑其服九彝八莽,或起侈心,而进一篑之戒。而况德本中人、智效一官者乎?是故政必期于有成也。’”<sup>[1]</sup>中兴之君周宣王的失德、春秋五霸齐桓公的骄横,都说明期成之道的根本在于在任何前提

下都必须善始善终,追求最完美的境界或结局,切忌虎头蛇尾,功亏一篑。而召公告诫武王关注“九彝八莽”的隐患是得以期成的成功典型。

第六,明辨。他对违己、从人、慎始、循中、期成五善所面临的困惑做出来解说:“无权易拔,无轴易脱,不可谓违己。左言则左,右言则右,不可谓从人。卿士气盈廷,发难不已,不可谓慎始。榜牒申命,日遵岁结,不可谓循中。考绩多良,治功不见,不可谓有成。若是者,辨之不明故也。集人成己,始终一贯,物不能蔽,人不能欺,功之成,不于成成,立志发令,已立其成。明辨于此,而后六善备焉。六善备,可以为政矣。”<sup>[1]</sup>可见,明辨之道的根本在于在任何前提下都必须对违己、从人、慎始、循中、期成五善有一个辩证的认识,要掌握好五善的火候和尺度。为政者要以辩证的思维去接受“六善。”既要坚持违己又要讲究原则,从人也要有主心骨,慎始不等于胡乱挑刺,循中不等于唯唯诺诺,有成不等无政绩等等原则,切忌将原则变为僵死的教条,从一个极端转入到另一个极端。

### 3 陈迁鹤的调研观

陈迁鹤(1639年~1714年,字声士,中国福建龙岩人)总结了注重调查研究、克服封建士大夫的弱点的为政之道。他认为善为政者要善于从古今形势的变化,九州风俗不同,人的感情的亲疏去了解治理天下的真谛,这是他对传统“外王”之道的创新所在。他从四个方面阐述论其注重调查研究、注重时局变化,反对空谈的观点。

第一,性命之学与经济之学,合则一贯,分则两途。陈迁鹤针对一些士大夫平时高言性命,仅仅探求空虚之理,不注重亲历实践当世实务,往往到了处理具体问题时就会措手不及的流弊,提出了“经济之学不行,所为性命者,但等诸枯禅用”的观点,强调士大夫只有周知天下情形,才不至于迂腐、浅陋而贻笑大方。他说:“经济之学不行,所为性命者,但等诸枯禅用甚矣!夫三代以下,自名曰儒者之迂疏也,皇皇者华之诗,其真善言治者乎?咨善为谏矣,有难之事在,必加之谋,已谋之矣,礼仪之经,可不以二也。已度之矣,爱我者无如属亲,是其成败利钝与我同之,而不忍以欺者,必申之以询。凡此者,岂为鳃鳃自下哉!”<sup>[2]</sup>陈迁鹤提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士大夫空谈性理,不实际所带来的缺失。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读书求知为参加科举考试以求仕途通达,这虽然是国家的政策导向所致,但

在现实中,常常会出现读书者未必会管理,会管理者往往受其学术水平的局限,不能将自己的思想总结出来流传后世,甚至在世界学术之林中占有一席地位的现象,使其后的政治家在近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不得不借鉴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遗憾,也是儒家传统文化观中最大的缺陷,其求稳求中求平求顺,而忽略了工具理性和理论体系的创新。

第二,识时务者为俊杰。调查研究需要辩证法作为指导思想,即要用发展的、具体的而非静止的、抽象的思想方法去指导调查研究。因为任何成功的政策与措施都是一时之务,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科书,为政者不可师心自用,拘泥于前人经验,而要顺应时势,不能违时。他说:“曹雪之规,不能行之于房杜;楚汉之策,不必施之于王窦。智时士与时推移者,留心于经世而讲求之道详也。夫其泥而违时者,自用乃师心,而讲求之道阙也。”<sup>[2]</sup>社会发展有着相对静止和永恒动态的特点,如果政治家用静止的、抽象的思想方法进行观察、决策,处理政务,势必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

第三,深入调查研究,克服官场积习。他认为士大夫的调查研究过程不是游山水、逛市场和谈浮华,要将深入探究的精神渗透到历山川、阅井疆、揽人才的工作中。他说:“历山川,但抒吟咏而不考其形势;阅井疆,但观市肆而不察其风俗;揽人才,但肆清谈侈浮华,而揣其德之所堪者。”<sup>[2]</sup>清代自康熙末期就出现了官场流弊,雍正通过厚养廉与大力整顿相结合的措施是该趋势有所收敛,但其在位时间只有是余年,而乾隆是一个好享受的皇帝,在其统治时期,发育了以和珅为代表的大贪官,使贿赂公行、竞相奢华之风气蔓延,其后的嘉庆、道光皆因能力、水平的局限未能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遏制此风,使之一直影响到晚清政风。陈迁鹤虽然生活在顺治、康熙时代,但他的远见卓识表现出一位政治人物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预见力。

第四,为政者要有责任意识。他希望士大夫要有自知之明,如果没有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不如做一个普通人。一旦从政为牧令,甚至为秉国大臣,掌握国家之重器,其危害不堪设想。他说:“若而人者,掩饰弗彰,独无失为善士,倘或司民之牧,秉国之钧,俾之因革,委以调剂,兴创不知孰利,改革不辨谁利害,荐举不识其贤,废黜不知其不肖,徇陋踵弊,貽毒已滋,忽然倡建,自申论议,非触戾人情,汨时之好,即繆固成迹,滞古之法,为患宁可胜道哉。”<sup>[2]</sup>

他呼吁有志于肩负天下重任者,必从我做起,从平时做起,访问解民生为政者的日常工作范围,这种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希望、百姓的安宁所在。如果没有对国情的深切了解,没有对有关政务的信息进行分析、甄别,没有从大处着眼,小出着手的精密细致的工作态度,那就不可能做出有利于国家、民族、百姓的决断和行动。

## 4 钱维诚的谦虚观

人们在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中,必须研究好与人相处的艺术,追求和衷共济的事业境界。因为无论个人能力如何,都受到能力、水平、精力的局限,只有善于集合群体的力量,并积极地融入其中才能为国成就大业。这就要求人们有着谦虚、求同存异的良好行为意识。

第一,去争论。钱维诚(生卒年不详,字宗盘、宗盘,号幼庵、稼轩、幼安、茶山,中国江苏武进人)认为:“天下之患,昏起于争,而争起于不平。吾不能去天下之争,平其不平者而已矣。”<sup>[1]</sup>因为平与不平是一个相对的存在,辩证的统一体,也即《大学》中“平者,平其不平者也”之意。《易》中有“坤上艮下为谦”之说。其象表明山与地有高低之分,损山之高补地之低,“而地无不平”;君子与他人的品格有多寡之分,损君子之多补他人之寡,就会“称物而平施。”诚然,要做到“谦”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谦”的含义是“能施不受”的境界,与“让”的含义“有所不受”有着区别。他提出君子损己益人,去争论、免祸乱、平天下的思想。他说:“故君子之于治也,小则损其财,大则损其心。吾损吾财,乃可以平天下之财;吾损吾心,乃可以平天下之心。”<sup>[1]</sup>钱维诚倡导人们在社会整体内部,必须遵守此损彼益、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

第二,戒满论。钱维诚认同满招损、谦受益的天下之道。“日中则昃,月盈则蚀。满招损,谦受益,天之道也。”他认为人们不可预言变化多端的天下之事,只有讨论已经发生的事情;人们也不能知晓变化多端的天下之患,只能预见其发展的趋势,探求其内在的规律,所以凡事都要留有运行的空间。他说:“处盛而矜,则患必中之,圣人持之以危。故曰:危者安其位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注水满杯而复斟之,则未知其流之于此乎!于彼乎!而溢则必矣。夫盛满之患,而骄矜之取败。夫人而知之,而贤智不免者,暇豫则智计不生,而危言苦之言不能入也。故言其已然,则言

可尽也；知其必然，则知不必尽也。”<sup>[4]</sup> 处极盛而衰，物极则必反。天下形势常常是以内忧外患、外忧内患相互交替的状况出现。以严治国者会以宽失败，以温和着称者会以暴力灭亡。圣人为政之道不是努力寻找消弭祸患之策，而是应该重点探求防患于未然之法。

## 5 曾国藩的“八术”说

如果说唐甄的思想还有抽象难懂、纸上谈兵之嫌，那么曾国藩的思想就体现出具体、务实和通俗的特点，再加上他自己事业的空前成功，又使其观点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中国湖南湘乡人）强调：“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操斯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sup>[5]</sup> 结合曾国藩的其他言论的相互印证，其“八术”说可以解读成四点富有启发意义的原则。

第一，兼容并包、量才器使的人才观。他就得人之道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委员之道四者为要：一曰习劳苦以尽职；一曰崇俭约以养廉；一曰戒傲惰以正俗。绅士之道以四者为要：一曰保愚懦以庇乡；一曰崇廉让以奉公；一曰禁大言以务实；一曰扩才识以待用。”曾国藩对养廉的历史沿革有清醒的认识：“文官加养廉，始于雍正三年之耗羨归公；五官加养廉，始于乾隆四十六年之补缺额名粮。”<sup>[5]</sup>

第二，诲人不倦、严守纲纪的御下观。他以训诫李次青为例对御下观的戒浮、戒谦、戒滥、戒反复、戒私进行了说明：“李次青赴徽州，余与之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谦，为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人为人择官也。”<sup>[5]</sup> 曾国藩“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人为人择官”之论令人深思。

第三，齐家治国的统筹观。他对其为政得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反复推敲、用心品味，总结出居官四败和居家四败的原则：“昔年曾以居官四败，居家四败，书于日记，自以儆惕，兹恐久而遗忘，在书于此。与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败曰：昏惰任下者败，傲很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逸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仕宦之家，不犯此八败，庶有悠悠气象。”<sup>[5]</sup> 他的“仕宦之家，不犯此八败”之论意在

将治国和治家统一思考，也是现实政治的反映。因为修齐治平原则要求先齐家再治国平天下，只有家中有“悠悠气象”，国家能蒸蒸日上。

第四，经天纬地、纵横宇内的治国观。他以古代圣贤的文学、事功二途为成才榜样，时刻纠正自己的不足。他说：“古来圣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惟是尽心养性，保全天之所以赋予我者。”又说：“古来圣哲胸怀宽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晬面，孔彦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sup>[5]</sup>

与唐甄的“六善”说相比，曾国藩的“八术”说更加富有将内在修为与外在事功相结合的特点，即富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色彩，它展示出给人们以更加开阔的从政视野和无限的思辨空间。曾国藩的“八术”说富有将内在修为与外在事功相结合的特点，即富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色彩，它展示出给人们以更加开阔的从政视野和无限的思辨空间。他将为政之道分为“得人”和“治事”两门，是宋代理学先声、大师胡瑗在培养管理人才时将功课分为“经义”、“治事”两门的思路延续和发扬光大，这是他身为儒臣在长期的宦海生涯中的“内圣外王”的真实写照。曾国藩一无家学、二无根底，但他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和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人们推崇的末世圣人。其言行无意间谱写了一部炉火纯青的官场绝学，把中国人为官的政治智慧与处世谋略阐发得淋漓尽致。这正是他能对现代中国政党政治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蒋介石产生重大影响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将他视为清代中国为政之道的集大成者并不为过。

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也为在新时代领导人所发扬光大。

毛泽东早期追求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并对晚晴经世大臣曾国藩很是佩服。他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sup>[6]</sup>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之言已经家喻户晓；“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明他在军事救国上的特殊认知。

习近平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修身

齐家”的精髓有着系统而严密的阐述：首先，要重视“反躬自省、自我批评”，“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其次，要“遵纪守法、不碰底线”，“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最后，要“防微杜渐、不弃微末”，“慎权、慎独、慎微、慎友”。“所有这些，可说为干部的崇德修身，建设良好家风，既标注了的认识论，又标注了方法论”。<sup>[7]</sup>

### 参考文献

- [1] 唐甄. 六善·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治体一·原治上)》[M]. 上海:广百宋斋校印1891年版.
- [2] 陈迁鹤.《储功篇下》,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一《学术一·原学》[M]. 上海:广百宋斋校印1891年版.
- [3] 钱维诚.《去争论》,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七《治体一·原治上》[M]. 上海:广百宋斋校印1891年版.
- [4] 钱维诚.《持满论》,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七《治体一·原治上》[M]. 上海:广百宋斋校印1891年版.
- [5]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二卷(上)》,《曾国藩全集》(第11册)[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6796、6796、6794-6795、6795-6796、6791、6776、6777.
- [6] 毛泽东. 毛泽东早期文稿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5.
- [7] 司马童. 习近平念念不忘“修身齐家”说明了啥 [EB/OL]. 光明网时评频道,2016.  
[https://guancha.gmw.cn/2016-02/02/content\\_18767358.htm](https://guancha.gmw.cn/2016-02/02/content_18767358.htm)